

【专题研讨:政策倡导】

嵌入性倡导:中国社会组织 政策倡导的行为逻辑

郭施宏 王 宁 何雪松

【摘 要】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本研究系统检验了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的影响因素,识别了其行为逻辑。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政治认可是影响政策倡导的核心因素,社会组织的行动呈现出“嵌入式倡导”的逻辑,即在获得政治支持和认可的范围内开展政策倡导活动。第二,异质性结果反映了政策倡导逻辑的张力,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具有较高的嵌入性,更依赖政府让渡的空间与资源;而东部地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组织自身能力在其中起到了显著作用。第三,政策倡导往往出现于社会组织具备较强实力和积累较丰富经验之后,尤其是向政府直接进行倡导的方式,它对组织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独特的政策倡导逻辑和有特色的政社关系。

【关键词】非营利倡导;政社关系;政治关联;嵌入性发展;宏观社会工作

【作者简介】郭施宏,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专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发展、政社关系;王宁,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

【原文出处】《社会学评论》(京),2024.2.108~130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研究基地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10月,民政部印发《“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提出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从注重数量增长、规模扩张向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转型”。如何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并以此促进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成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亟须回应的现实问题。但是,“重服务、轻倡导”,“重微观、轻宏观”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现状(邓亦林、郭文亮,2016;陶传进,2012)。广义上的政策倡导(policy advocacy)是指个人或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政府决定的行为,包括与政府沟通、教育公众、动员社会等(Reid,1999)。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行为主要是指社会组织通过制度关联或社会动员,向政府部门或社会公众传递特定理念,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反馈等政策过程(Andrews & Edwards,2004;杨

佳譞、孙涛,2019)。

然而,政策倡导作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职能和方式,不仅未受到足够重视,也未发挥其应有的效用。社会工作领域的社会组织情况亦是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面临微观社会工作和宏观社会工作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存在“去社会变革化”的趋势(Rothman & Mizrahi,2014;李伟,2018)。因此,有学者呼吁社会工作发展应找回“社会”使命(何雪松,2020)。而中国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下简称“社工机构”)受限于组织外部和内部的多重因素,存在发声难、发声弱的问题,无法有效代表社会公众向政府表达和实现公共诉求(Guo,2023)。因此,选择社工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影响因素与行为逻辑具有典型意义,同时有助于促进社工机构的“社会性”作用

发挥,推动社会力量有序高效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升社会治理绩效。

社会组织政策倡导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但是,由于社会组织在政策倡导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与政府立场相抵牾的情况,因此,“去政治化”往往是中国社会组织的首要考虑(Ho & Edmonds, 2008; Howell, 2015)。于是,自我限制成为大部分社会组织采取行动策略的出发点,它们也会对政策倡导持相对回避的态度(Heurlin, 2010; Spire, 2011)。由此,社会组织会维系政社关系,主要采取合作和参与的方式开展行动。有学者将中国社会组织这种严格在体制许可范围内的活动逻辑称为“嵌入性行动主义”(embedded activism)(Ho & Edmonds, 2008; Lin, 2007; Yang, 2005)。研究中国的学者认为“嵌入性”的概念特别适合描述中国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博弈关系,认为社会组织只有“嵌入”国家政治情境,才能谋求发展空间(Gaudreau & Cao, 2015)。同样地,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也被认为是基于“嵌入性发展”的逻辑,即社会工作嵌入原来的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之中,并在行政性社会工作覆盖和主导的空间中谋求发展和发挥作用(王思斌、阮曾媛琪, 2009)。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政策倡导行为是否也具有“嵌入性”特征,目前缺乏足够的量化实证研究(Almog-Bar & Schmid, 2014; Kim & Kim, 2015; Mosley, 2011)。另外,学界对于这种嵌入性的制度关联对政策倡导会产生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也存在争议(Ni & Zhan, 2017; 李朔严, 2018; 赵挺、袁君翱, 2022)。

为回应以上问题,本研究的设计如下:首先,从制度机会、资源依赖和组织能力三个理论视角,系统综述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其次,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依据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选择和处理相应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表征指标;再者,通过因子分析对解释变量的表征指标进行降维和提取公因子,将公因子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回归模型;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和异质性分析,检验和分析研究假设和研究结果,并进一步讨论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行为逻辑。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无论是西方学者所谓的“嵌入性行动主义”,还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嵌入性发展”,嵌入性都是理解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的关键视角,反映的是

制度机会对于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首先基于制度机会理论,综述制度关联与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关系;然后,基于另外两个解释政策倡导行为的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组织能力理论,发掘影响政策倡导的可能因素,进而提出研究假设。

(一)制度机会与政策倡导

制度机会被认为对社会组织的行具有关键性影响(Dalton et al., 2003; Stroup & Murdie, 2012; 陆健等, 2019)。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环境是影响社会组织发展最重要的因素(Wang & Liu, 2009)。社会组织的生存与成长的活动空间和所需资源依赖于国家的让渡和支持。有学者认为,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中,来自政府的信任最为重要(Slyke, 2007)。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也会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产生关联,增强政社关系紧密性,从而优化生存环境和寻求发展资源(和经纬等, 2009)。例如,社会组织通过聘用离退休公务员进入组织理事会,开展党建工作,以及组织领导者进入国家机构或党群组织工作,与国家机构人员建立私人关系等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制度关联(李朔严, 2018; 张紧跟、庄文嘉, 2008; 张钟汝等, 2009)。

对于政策倡导而言,一方面,通过制度关联获得制度机会会有助于丰富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渠道,增加社会组织发声和影响决策者的机会(Zhan & Tang, 2013)。制度关联有助于社会组织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为政策倡导提供参与机会;也有助于社会组织了解政策过程的细节,激发他们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Berry & Arons, 2003; Kelleher & Yackee, 2009)。有研究表明,与政府之间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增加,可以增加社会组织与政府高级官员进行深入交流与对话的可能性,其倡导的内容就更可能进入政策议程中并得以实现(Hudson, 2002; Onyx et al., 2008)。另一方面,政府的嵌入也有助于社会组织在资金、人力、政策优惠等方面获得政府支持(Ni & Zhan, 2017)。政府支持能为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活动提供稳定的资金流(Moulton & Eckerd, 2011),也是社会组织获得政治认可的重要体现。有研究指出,政府资助和政策倡导活动间已经形成了正反馈的关系,社会组织越希望获得政府的资金,就越会积极地投入政治倡导活动中去(Mosley, 2012)。总之,制度

关联会让社会组织更有动力和能力参与政策倡导(Leroux & Goerdel, 2009; Li et al., 2017)。

然而,部分研究也指出,政社关系过于紧密,可能会导致社会组织丧失自主性,限制其政策倡导的活动空间(敬义嘉,2016)。政府的嵌入可能会导致社会组织回避激进的政治活动或不受政府欢迎的倡导活动,因为它们担心政策倡导会与政府官员产生冲突,危及政社关系,以致失去政府的资助(Chavesc, Stephens & Galaskiewicz, 2004; Spires, 2011)。而且,政府可能会更支持社会组织的服务性活动,这也会抑制政策倡导活动(Almog-Bar & Schmid, 2014; Guo & Saxton, 2010)。因此,一些社会组织为了自己的政治游说活动,会摆脱政府的嵌入(Bloodgood & Tremblay-Boire, 2017)。

已有研究尚未形成制度关联对于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影响的确定结论。然而,我们认为,政治认可和政社关系紧密度整体上会促进中国社会的政策倡导行为,即假设1。一是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很多社会组织和政府关系并不紧密,在这一阶段,政治认可对政策倡导整体上可能会产生正向作用。二是现有认为政治认可可能对政策倡导产生负向作用的研究,更多反映的是对政策倡导效果以及对敏感性议题倡导的负向作用,而非一般性的政策倡导行为。相应地,制度关联可能会促进社会的政策倡导行为,即假设1a。但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关联与政治认可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强调社会组织一方的主动行为,后者更强调政府一方的态度与行为。制度关联,尤其是较弱的或间接的制度关联,大多意味着获得的政治认可度不高。

假设1:社会组织获得的政治认可越强,政社关系越紧密,政策倡导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1a:社会组织的制度关联越强,政策倡导的可能性越大。

(二)资源依赖、组织能力与政策倡导

资源依赖是影响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Mccarthy & Zald, 1977)。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无法生产自身所需要的所有资源(Pfeffer & Salancik, 2003)。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展需要外部环境的资源支持,因此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受制于资源获取对象、方式和数量。有研究表明,组织掌握的资源与该组织参与政治活动的活跃度密切相关(Schlozman & Tierney, 1986),拥有更多资源有利于社

会组织提高政策倡导的能力(Zhan & Tang, 2013)。也有研究认为,组织资源的水平对不同类型组织行为的影响是有差别的,拥有更丰富资源的社会组织往往倾向于开展常规的低风险活动(Oberschall, 1993)。

对于中国社会组织而言,制度机会和资源依赖是高度关联的,社会组织的制度空间和活动资源多来自政府让渡。类似地,社会组织会通过资源关联的方式与资源提供方形成联系,以方便获取相应的活动资源。相比制度关联,社会组织资源关联的方式和对象更加多样。根据政策倡导活动的需要,社会组织可以与政治体制产生关联,也可以与行业协会、高校智库、媒体机构、法律机构等产生关联,这些组织可以为社会的政策倡导行动提供其不具备的资源和渠道(纪莺莺,2016;李朔严,2017;杨佳譔、孙涛,2019)。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社会组织的资源关联越强,政策倡导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2a:社会组织获得的专业支持越强,政策倡导的可能性越大。

另外,组织能力视角从微观视角强调了组织自身的能动性。第一,组织能力论认为社会组织的能力会影响其在社会公众和政社互动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王名、蔡志鸿,2019)。有研究指出,规模大、财政状况好、专业化程度高的社会组织更容易介入政策倡导(Zhang, 2017)。

第二,领导者能力、个人特质或领导风格会影响组织的倡导行为。领导者的智慧、私人资源、认知等要素不仅有助于组织获取政策倡导所需的资源,也有助于打开政策倡导的机会之窗和改变决策者的政策偏好(Teets, 2018)。赛奇认为,社会组织通过与体制内精英的关系或者创始人自身在体制内的身份,传递组织的政策理念,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Saich, 2000)。有研究发现,社会精英,如大学教授、资深媒体人等出身的社会组织领导者,他们具有的政治资源可以令组织更接近政策过程,且能与政府机构和企业等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争取更大的空间参与政策倡导(Zhan & Tang, 2013)。

第三,理事会参与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重要方面。一方面,理事会参与内部治理能够促使组织团队不偏离组织目标;另一方面,作为组织资本,理事会可以为社会组织提供知识、技能、管理经验、关系

人脉、财力物力、社会声誉等方面的资源(Amy & Thomas, 2003; Brown, 2007; Vidovich & Currie, 2012)。国内外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理事会的治理能力和表现能够有效提高社会组织的治理绩效(Brown, 2007; 叶士华、何雪松, 2021)。相应地,理事效用也可以为政策倡导提供资源和智力支持。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 社会组织整体能力越强,政策倡导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 3a: 社会组织领导效用越强,政策倡导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 3b: 社会组织理事效用越强,政策倡导的可能性越大。

综上,制度机会、资源依赖和组织能力构成了解释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的理论基础,本研究将基于此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识别出中国独特的政策倡导逻辑。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019 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库。该项目由华东理工大学

发起,是中国首个以社会工作行业发展动态为主题的全国性、综合性学术调查项目。项目团队于 2019 年 6-10 月在全国 22 个省、4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共 56 个城市开展了首期调查,项目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回收问卷 993 份,其中有效问卷 97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59%。在有效样本中,长三角样本占 32.58%,珠三角样本占 13.39%,其他城市样本占 54.03%;从事服务领域分别为社区服务(74.15%)、青少年服务(67.28%)、儿童服务(64.62%)、老年人服务(55.43%)、家庭服务(46.30%)、妇女服务(45.69%)、残障服务(40.31%)、外来人口服务(21.83%)、矫正和戒毒服务(21.73%)、救助性服务(21.71%)、科研评估服务(16.27%)、企业服务(13.49%)和医疗服务(9.98%) (刘畅等, 2020)。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 解释变量

基于代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本研究依据制度机会、资源依赖和组织能力三类理论,共选择了 22 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的表征指标。各表征指标的代码、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制度机会、资源

表 1 解释变量的表征指标与描述性统计						
理论依据	指标	指标代码	指标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制度机会	政府资金支持情况	fsupport	离散变量。0-否,1-是。	0.67	0.470	952
	政府人力支持情况	hsupport	离散变量。0-否,1-是。	0.38	0.486	952
	政府政策支持情况	psupport	离散变量。0-否,1-是。	0.65	0.478	952
	政社互动情况	interaction	连续变量。指社会组织与市级、县区级政府联系的紧密度。数值介于 0-5,数值越大,联系越密切。	2.90	1.131	952
	总干事政治面貌	lpolitics	离散变量。0-非党员,1-中共党员,2-民主党员。	0.61	0.598	952
	总干事出身	lidentity	离散变量。指组织总干事从事社会组织工作前的身份。0-其他,1-政府人员或离退休官员。	0.05	0.225	952
	领导者政治关联情况	pconnection	离散变量。0-机构人员未正/曾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1-机构人员正/曾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0.16	0.371	952
	理事会中是否有离退休公务员	civilser	离散变量。0-否,1-是。	0.09	0.293	952
	党建工作情况	ccp	离散变量。0-无党建部门,1-有党建部门。	0.46	0.499	952
	总部所在地	location	离散变量。0-非北京,1-北京。	0.05	0.219	952
资源依赖	理事会中是否有记者	journalist	离散变量。0-否,1-是。	0.04	0.191	952
	理事会中是否有律师	lawyer	离散变量。0-否,-是。	0.07	0.261	952
	理事会中是否有高校教师	uniteacher	离散变量。0-否,1-是。	0.39	0.489	952
	行业关联情况	aconnection	离散变量。0-非行业协会会员,1-行业协会会员。	0.57	0.496	952
	高校合作情况	unicoop	离散变量。0-无和高校合作,1-有和高校合作。	0.51	0.500	952
	新媒体运用情况	nmedia	离散变量。0-非经常更新新媒体(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其中之一),1-经常更新新媒体。	0.80	0.398	952

续表 1

理论依据	指标	指标代码	指标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组织 能力	组织成立时长	age	连续变量。指组织截至2018年年底的成立时长(单位:年)。	4.97	3.373	952
	组织规模	pop	连续变量。指截至2018年年底机构总人数(单位:人)。	27.54	68.324	952
	组织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	fedu	连续变量。指截至2018年年底机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单位:人)。	15.26	40.912	952
	总干事学历	ledu	离散变量。0-本科以下,1-本科及以上。	0.76	0.428	952
	理事会能力	ability	连续变量。组织负责人对理事会6项能力情况评价的平均值。数值介于0~5,数值越大,表示能力越强。	3.74	1.009	952
	理事会作用	function	连续变量。组织负责人对理事会7项作用发挥情况评价的平均值。数值为0~5,数值越大,表示作用越大。	3.67	1.039	952

依赖和组织能力三种理论存在交叉和关联,例如:组织领导者的政治关联情况,既可以体现政治认可程度,也可以体现组织的领导者特质;新媒体运用情况既可以从资源视角反映组织通过媒体从外部获取资源的能力,也可以从组织视角反映组织的内部建设能力;等等。因此,被解释变量的表征指标并未严格进行类别划分,还应从数理特征上做进一步处理。

2. 被解释变量

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通过6个项目对被调查机构过去一年的政策倡导行为进行了调查。依据直接政策倡导和间接政策倡导的含义(Andrews & Edwards, 2004; Li, Lo & Tang, 2017),为方便理解和呈现,本研究将6项倡导行为分类命名,包括:直接倡导项目1,即“参与或主导行业、专业政策、标准和指南的制定”;直接倡导项目2,即“参与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决策咨询和协商”;直接倡导项目3,即“向政府部门反馈/提出专业意见”;间接倡导项目1,即“为社区弱困群体实施过政策倡导”;间接倡导项目2,即“通过媒体实施行业专业相关政策倡导”;间接倡导项目3,即“通过行业协会实施政策倡导”。数据显示,超过60%的社会组织在被调查时的过去一年中向政府部门反馈或提出过专业意见(直接倡导项目3),这一方式是社会组织最为常见的倡导行为。另外,有将近50%的社会组织为社区弱困群体实施过

政策倡导(间接倡导项目1)。整体上看,社会组织的直接政策倡导频次少于间接政策倡导频次,其中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决策咨询和协商(直接倡导项目2)的比重最低,仅占27.4%。

为了提高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调查结果做以下处理,以得到被解释变量。首先,设置两类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直接政策倡导”和“间接政策倡导”。其次,将被解释变量设置为二元离散变量,认定过去一年参与过3项直接倡导项目的社会组织符合“直接政策倡导”的要求,将该类社会组织赋值为1;不符合的赋值为0。同理,认定过去一年参与过3项间接倡导项目的社会组织符合“间接政策倡导”的要求,将其赋值为1;不符合的赋值为0。再次,放松被解释变量要求,将“参与过3项倡导项目”的要求降低至“至少参与过2项倡导项目”,从而获得宽松版的被解释变量“直接政策倡导_1”和“间接政策倡导_1”,用于实证分析中的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的指标选取、代码、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研究,解释变量的表征指标多达22项,部分指标具有相似性,在理论初筛中难以选择,但若均将其纳入回归模型又将造成较大的自由度损失和多重共线性问题。鉴于此,本研究首

表2 被解释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指标	指标代码	指标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直接政策倡导	direadv0	离散变量。1-参与过3项及以上直接政策倡导项目;0-不到3项。	0.158	0.365	979
直接政策倡导_1	direadv01	离散变量。1-至少参与过2项直接政策倡导项目;0-不到2项。用于稳健性检验。	0.387	0.487	979
间接政策倡导	indireadv0	离散变量。1-参与过3项及以上间接政策倡导项目;0-不到3项。	0.173	0.378	979
间接政策倡导_1	indireadv01	离散变量。1-至少参与过2项间接政策倡导项目;0-不到2项。用于稳健性检验。	0.371	0.483	979

先对解释变量的表征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通过降维提取公因子,再将具有代表性和解释力的公因子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其次,鉴于解释变量已涵盖了绝大部分的影响因素,过多的控制变量加入同样会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研究选择了两项相对外生的因素进行控制,包括机构功能定位(orient),即从事专门型服务或非专门型服务,以及机构所在地经济水平(pgdp),即机构所在地的人均GDP。

再者,本研究采用二分类逻辑斯蒂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估计各类因素对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影响。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研究采用变量替换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通过放松对被解释变量的要求,获取宽松版的被解释变量纳入模型进行逻辑回归,进而解析制度机会、资源依赖和组织能力对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的影响机制。

最后,为进一步观察回归结果的异质性,本研究还从社工机构所在的地理区位差异(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以获得更深层次的结论,并识别中国社会组织独特的政策倡导逻辑。

四、实证分析

(一)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本研究先通过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判断指标间的相关性以及是否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表明,KMO值为0.659,大于0.5,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原始指标间很可能存在有意义的联系,即存在公因子。接下来,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各因子的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反映了其对所有原始变量总方差的解释能力,其值越高说明因子越重要。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使各个变量能够更好地解释各个公因子,并根据特征值大于1进行因子提取。结果显示,22个指标共提取了7个公因子,第一公因子至第七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介于10.120%至5.326%,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3.448%。

通过Kaiser标准化正交旋转法,在八次迭代后收敛得到分析结果。^①因子旋转模型结果显示,第一公因子(F1)在组织规模(pop)、组织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fedu)和组织成立时长(age)的比重载荷最大;第二公因子在理事会中是否有高校教师(uniteacher)、高校合作情况(unicoop)、行业关联情况(aconnection)、党

建工作情况(ccp)和新媒体运用情况(nmedia)的比重载荷最大;第三公因子在理事会能力(ability)和理事会作用(function)的比重载荷最大;第四公因子在政府资金支持情况(fsupport)、政府人力支持情况(hsupport)、政府政策支持情况(psupport)和政社互动情况(interaction)的比重载荷最大;第五公因子在理事会中是否有记者(journalist)和理事会中是否有律师(lawyer)的比重载荷最大;第六公因子在总干事政治面貌(lpoltics)、领导者政治关联情况(pconnection)和总干事学历(ledu)的比重载荷最大;第七公因子在总干事出身(lidentity)、总部所在地(location)和理事会中是否有离退休公务员(civilser)的比重载荷最大。

为方便理解,本研究根据各公因子的内涵将其重新命名。第一公因子(F1)从组织人员规模、人员学历构成、组织资历方面反映了组织的整体能力,因此将其命名为“组织整体能力”;第二公因子(F2)反映了社会组织与高校、行业、党组织和媒体等外部资源的关联情况,因此将其命名为“资源关联”;第三公因子(F3)代表了组织理事的能力和作用,因此将其命名为“理事效用”;第四公因子(F4)反映了来自政府的资金、人力和政策支持,以及政社联系的紧密度,因此将其命名为“政治认可”;第五公因子(F5)实际上反映的也是组织的资源关联情况,但突出了理事会中的媒体和法律等专业智力资源对组织的支持,因此将其命名为“专业支持”;第六公因子(F6)反映了组织领导者的直接政治关联和个人能力,因此将其命名为“领导效用”;第七公因子(F7)包含的指标反映了组织总干事在担任社会组织领导前是否为公务人员,组织理事会中是否有离退休公务员,以及组织所在地地理位置是否为北京,与第六公因子中领导者的直接制度关联指标(如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相比,这些指标(曾为公务人员或靠近政治中心)都具有间接制度关联的特征,因此将其命名为“间接制度关联”。

(二)回归分析

1. 解释检验

在控制了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和所在地经济水平后,本研究将七大公因子对社会组织直接与间接政策倡导的影响进行回归估计,并通过变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见下页表3)。结果显示,在直接政策倡导中(模型1和模型3),社会组织的组织整体能力、资源关联、理事效用、政治认可、专业支持和领导效用对直接倡导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

表3 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

变量	模型1直接政策倡导	模型2间接政策倡导	模型3直接政策倡导_1	模型4间接政策倡导_1
组织整体能力	0.3671*** (4.90)	0.4351*** (5.71)	0.5757*** (3.73)	0.4203*** (4.41)
资源关联	0.5570*** (5.72)	0.4185*** (4.57)	0.5353*** (6.97)	0.4313*** (5.64)
理事效用	0.2627*** (2.61)	0.3158*** (3.22)	0.2430*** (3.11)	0.2858*** (3.83)
政治认可	0.5641*** (5.38)	0.7685*** (7.26)	0.4718*** (6.09)	0.5809*** (7.40)
专业支持	0.3622*** (4.51)	0.2305*** (2.95)	0.4371*** (5.38)	0.3120*** (4.16)
领导效用	0.6218*** (6.10)	0.0862 (0.88)	0.4365*** (5.64)	0.1702** (2.35)
间接制度关联	-0.1414 (-1.24)	0.0703 (0.75)	-0.1775** (-2.10)	-0.0519 (-0.69)
机构功能定位	-0.1717 (-0.75)	0.1017 (0.50)	-0.3314** (-1.99)	0.0881 (0.55)
机构所在地经济水平	-0.0216 (-0.74)	-0.0616** (-2.26)	0.0131 (0.58)	-0.0856*** (-3.77)
常数项	-1.8006*** (-5.28)	-1.2541*** (-3.86)	-0.5781** (-2.16)	0.2764 (1.05)
样本数	941	941	941	941
R ²	0.1716	0.1362	0.1690	0.1200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这些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而间接制度关联对直接政策倡导影响显著性并不稳健。在间接政策倡导中(模型2和模型4),组织整体能力、资源关联、理事效用、政治认可、专业支持对社会组织间接倡导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这些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

实证结果表明,制度机会、资源依赖和组织能力在整体上对于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首先,从制度机会的角度看,来自政府的政治认可对政策倡导具有促进作用。在有直接倡导行为的社会组织中,有80%的受调查组织得到过政府的资金支持,48%的组织得到过政府的人力支持,73%的组织得到过政策支持,他们与政府互动的紧密度为3.49;而在没有直接倡导行为的样本中,三项政府支持力度均明显低于前者,分别为65%、37%和63%,政社互动紧密度为2.79。类似的结果也体现在间接倡导行为上。这一结果吻合主流观点认为的政府支持有助于促进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Li, Lo & Tang, 2017; Mosley, 2012)。人财物的支持以及良好的政社关系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更宽松的制度空间有助于社会组织获得政策倡

导的渠道和动力。

其次,从资源依赖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组织无法生产其所需的所有资源,尤其是政策倡导涉及的广泛资源,因此必然会向组织外部环境关联和摄取相关资源。社会组织与高校、行业协会、党组织、媒体、法律机构等组织的资源关联强度与其直接或间接政策倡导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在参与政策倡导的社会组织中,大部分组织与高校资源、行业资源和社会资源有紧密联系,在法律、宣传等方面获得了专业支持。与外部组织的资源关联为政策倡导提供了行动资源、智力支持、专业指导、社会影响等多方面保障。

再次,从组织能力的角度看,组织能力和自身能动性也是影响组织开展政策倡导行动的关键要素。参与政策倡导的社会组织在组织人员规模、学历构成、成立时长、理事会能力和作用方面均明显优于未参与政策倡导的组织。这说明,政策倡导对于中国社会组织而言是一项相对“高阶”的行动内容,组织往往在具备较强的实力和积累较丰富的经验后才会开展此类活动。

最后,相比来自政府的直接支持和认可,社会组

织的间接制度关联对其倡导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社会组织成员的既往公务员身份,以及组织地理位置是否靠近政治中心等间接制度关联方式,并未明显促进组织直接向政府进行政策倡导。形成这一结果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是已经离开体制的公务员能为社会组织带来的倡导资源可能十分有限,尤其是那些已经离开体制多年的社会组织领导者;二是随着新媒体技术和公共交通的快速发展,社会组织接近体制开展政策倡导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和便利。有研究曾指出,位于北京的组织更易于开展政策倡导活动,它们在吸引公众关注和游说政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Zhan & Tang, 2013),但这一地理区位优势,可能随着上述技术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明显。

综上,实证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1,即社会组织获得的政治认可越强,政社关系越紧密,政策倡导的可能性越大;研究假设2和2a,即社会组织的资源关联越强,获得的专业支持越强,政策倡导的可能性越大;研究假设3、3a和3b,即社会组织整体能力、领导效用和理事效用越强,政策倡导的可能性越大。但实证结果未能验证研究假设1a,即间接制度关联未显著影响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

2. 结果比较

尽管社会组织直接和间接政策倡导的影响因素在整体上相似,但依然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在专业支持方面,专业支持公因子具体包括与专业记者的关联和与律师的关联。尽管这一因素对社会组织的直接和间接倡导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在参与过直接倡导的社会组织中,有7%的组织理事会中有记者,这一指标在未参与过直接倡导的组织中仅为3%;同时,在参与过直接倡导的组织中,有15%的组织理事会中有律师,而后者仅有6%。而在间接倡导组中,这一差距较小,在1%左右。这一结果说明,相比间接倡导,向政府直接进行倡导的方式,包括向政府提出专业意见和反馈、参与政府政策协商、参与政策标准制定等,对于社会组织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专业支持对这类倡导的影响也更为明显。

第二,在领导效用方面,由领导者政治面貌、学历和政治关联所构成的领导效用公因子,仅对社会组织的直接倡导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对间接倡导的影响的显著性不稳健。在直接倡导组,领

导者的政治面貌、学历和政治关联,在参与过直接倡导和未参与过直接倡导的社会组织之间有明显区别:前者中分别有67%的领导者加入了某党派(中共党员或民主党派党员),87%的领导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41%的组织中有领导者正/曾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②;而后者中的比重分别为52%、74%和12%,远低于前者。但是,领导特质在间接倡导组并没有明显区别。该结果验证了相关实证研究的观点,即领导者个人“关系”对于社会组织参与政策过程的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因为他们拥有政治资源,更接近政策决策过程,且能与政府机构和企业等保持沟通渠道畅通(Zhan & Tang, 2013, 2016)。

(三) 异质性分析

为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行为逻辑,本研究在基础回归之上,从社会组织的地理区位维度对直接和间接政策倡导影响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③下页表4和表5从地理区位异质性的角度,分别报告了社会组织直接与间接政策倡导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在影响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因素上,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首先,从整体上看,政治认可对于东、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的直接与间接政策倡导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无论是全样本回归、分样本回归,还是直接倡导或间接倡导的影响因素,政治认可都是唯一显著且稳健的因素。由此,中国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呈现出典型的“嵌入性”特征,即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活动是在政治认可的基础上开展的。

其次,比较区域差异可以发现,区域间社会组织的“嵌入性倡导”逻辑有所不同。东部地区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影响因素相对多元,政治认可、组织能力、资源关联和专业支持均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政治认可可是唯一显著且稳健影响社会组织开展政策倡导的因素。这一结果反映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不同的发展环境和嵌入程度,前者的政策倡导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后者的政策倡导更依赖于政府支持。从制度机会和资源依赖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相对宽松与包容,组织资源来源更加充分和多元,相较而言,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相对保守,组织资源来源相对有限且对政府资源有更高的依赖性。因此,政治认可对于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尤为关键,其政策倡导对政府的依赖性更强,呈现出较高

表4 社会组织直接政策倡导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地理区位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直接政策倡导	模型5 东部地区	模型6 中部地区	模型7 西部地区
组织整体能力	0.3267*** (4.39)	1.2702*** (2.61)	1.6126*** (2.90)
资源关联	0.5939*** (5.03)	0.2529 (0.65)	0.3938 (1.56)
理事效用	0.2047 (1.61)	-0.1580 (-0.49)	0.4321** (2.10)
政治认可	0.5466*** (4.35)	0.8387* (1.80)	0.5887** (2.52)
专业支持	0.3548*** (3.72)	0.0279 (0.10)	0.4354* (1.95)
领导效用	0.7460*** (5.75)	0.3816 (1.08)	0.4797** (2.21)
间接制度关联	-0.0915 (-0.75)	-0.6268 (-1.07)	-0.4464 (-0.95)
机构功能定位	-0.7206** (-2.32)	0.7617 (1.10)	0.6737 (1.45)
机构所在地经济水平	-0.0006 (-0.02)	-0.3540** (-2.00)	-0.0804 (-0.52)
常数项	-1.9430*** (-3.93)	0.8644 (0.53)	-1.4770 (-1.23)
样本数	601	111	229
R ²	0.2038	0.1864	0.2150

表5 社会组织间接政策倡导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地理区位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间接政策倡导	模型8 东部地区	模型9 中部地区	模型10 西部地区
组织整体能力	0.4541*** (5.63)	0.6039 (1.06)	0.4489 (0.82)
资源关联	0.4751*** (4.39)	0.3048 (1.09)	0.3411 (1.40)
理事效用	0.3761*** (2.85)	0.3608 (1.25)	0.1142 (0.63)
政治认可	0.7070*** (5.36)	0.6398** (2.02)	1.0937*** (3.89)
专业支持	0.2721*** (3.03)	0.4446 (1.64)	-0.0499 (-0.31)
领导效用	-0.0359 (-0.27)	0.0187 (0.08)	0.6482*** (3.11)
间接制度关联	0.0978 (0.97)	-0.1373 (-0.31)	0.0066 (0.02)
机构功能定位	0.0778 (0.29)	0.5846 (1.02)	-0.1959 (-0.41)
机构所在地经济水平	-0.0728** (-1.98)	-0.1366 (-1.20)	0.0931 (0.60)
常数项	-1.1632** (-2.39)	-0.0964 (-0.08)	-2.7887** (-2.23)
样本数	601	111	229
R ²	0.1533	0.1257	0.1904

的嵌入性;而东部地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除政治认可外,组织自身能力在其中也起到了显著作用。

另外,异质性分析结果同样表明,就向政府直接倡导而言,组织能力和领导效用的作用是关键,这一类型的倡导不仅要求社会组织获得政治认可,同

时还对组织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和能力要求。

五、总结与讨论

当下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愈加频繁,传统观念认为的社会组织“重服务、轻倡导”的局面有所改变。对于这一现象,制度机会、资源关联和组织能力因素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具体而言,第一,政治认可可是影响政策倡导的核心因素,社会组织由此呈现出“嵌入式倡导”的行为逻辑,即社会组织在政治认可的基础上开展政策倡导。政府的人财物支持和良好的政社关系有助于社会组织获得政策倡导的制度空间和动力。但是,间接的制度关联,包括组织领导者过往的体制内身份以及地理区位上接近政治中心,对于政策倡导影响并不明显。第二,“嵌入性倡导”逻辑存在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呈现出较高的嵌入性,相较而言,其更依赖政府让渡的空间与资源,政治认可可是其政策倡导唯一显著且稳健的影响因素;而东部地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组织自身能力在其中起到了显著作用。第三,直接与间接政策倡导对于社会组织的要求存在一定差异,作为一项相对“高阶”的行动内容,政策倡导往往出现于组织具备较强实力和积累较丰富经验之后,尤其是向政府直接进行倡导的方式,它对社会组织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获得专业支持对这类倡导的影响更加显著。同时,组织领导者个人与体制的直接关联情况对社会组织参与直接政策倡导具有更明显的影响。

相较于西方非营利倡导的行为规律,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呈现出典型的“嵌入性倡导”逻辑。这整体上与学界普遍认可的“嵌入性发展”逻辑相吻合。大多学者认同中国社会组织的嵌入性发展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对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以及提供社会服务具有积极意义(Ni & Zhan, 2017; 何威, 2023)。然而,不同于社会服务功能,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功能具有一定的冲突性,社会组织的公共诉求表达容易出现与政府立场相左的情况,这使得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行动需要在政府支持和独立自主之间寻求平衡。因此,一味地“嵌入”并不一定有助于组织政策倡导目标的实现,这容易削弱组织自主性,出现“虚弱的自主性”和“模糊的专业性”的困境(肖小霞、张兴杰, 2012; 郑广怀、向羽, 2016)。组织政策倡导的范围和程度进而也可能受到较大限制,其质量与效果也可能受到影响。

但是,从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倡导并非一味地“嵌入”,而是富有张力的。显然,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行动相对被动,政策倡导活动的空间和资源严重依赖于政府让渡。然而,在东部较发达地区,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动性在政策倡导中显现出效用。正如埃文斯提出的“嵌入的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所描述的(Evans, 1995),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嵌入”中寻求自主(王诗宗、宋程成, 2013; 王思斌, 2011)。实际上,近来的一些质性研究刻画了东部地区一些社会组织如何在表达政策倡导中实现“嵌入的自主性”。例如,郭施宏、陆健(2021)描绘了江苏省某社会组织如何“绕开”制度路径,通过市场路径表达公共诉求,再回归制度路径的过程。李朔严(2017)通过比较浙江省三个社会组织的案例发现,与政府过强或过弱的关联都会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产生消极影响,而与政府保持适度的关系反而更有可能促进社会组织介入政策倡导。曹海林、王园妮(2018)的案例深描发现,有社会组织秉持“站在政府对面而非对立面”谋划合作以及“唱白脸和唱红脸”双面配合的原则,在有限的空间内寻找最佳的利益平衡点。这些研究都展现了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逻辑的张力。而本文的贡献即通过量化实证,识别和验证了这种富有张力的“嵌入性倡导”逻辑,这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独特的政策倡导逻辑和有特色的政社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仍有一些不足,需未来进一步探究。例如,受限于评价体系,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行为,而非政策倡导效果。尽管从调查数据上看,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发生的频率比预期高,但政策倡导实际效果如何,社会组织的公共诉求是否得以实现,还需进一步研究评价。另外,本研究从量化实证中识别出的“嵌入性倡导”的逻辑,仍有待未来更多的研究对其深层机理进行深入阐释。

注释:

①因篇幅限制,总方差解释和旋转成分矩阵结果未予呈现,可向作者索取。

②此处的组织领导者既包括现任的组织总干事,也包括卸任的总干事、创始人、法人等具有组织领导者身份的人员。

③作者也进行了社会组织注册级别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对于核心结论同样具有稳健性。因篇幅限制未予呈现,感

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1]曹海林、王园妮,2018,《“闹大”与“柔化”:民间环保组织的行动策略——以绿色潇湘为例》,《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2]邓亦林、郭文亮,2016,《中国特色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现实困境与图景表达》,《求实》第7期。

[3]郭施宏、陆健,2021,《环保组织公共诉求表达的市场路径及其成因——一个组织学习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第2期。

[4]何威,2023,《现实形塑与科学回归: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规范图景及其超越》,《社会科学》第4期。

[5]何雪松,2020,《积极而非激进:宏观社会工作的中国图景》,《学海》第1期。

[6]和经纬、黄培茹、黄慧,2009,《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 NGO 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 NGO 为例》,《社会》第6期。

[7]纪莺莺,2016,《转型国家与行业协会多元关系研究——一种组织分析的视角》,《社会学研究》第2期。

[8]敬义嘉,2016,《控制与赋权:中国政府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学海》第1期。

[9]李朔严,2017,《政治关联会影响中国草根 NGO 的政策倡导吗?——基于组织理论视野的多案例比较》,《公共管理学报》第2期。

[10]——,2018,《政党统合的力量:党、政治资本与草根 NGO 的发展——基于 Z 省 H 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社会》第1期。

[11]李伟,2018,《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基于美国百年社会工作史的分析》,《社会》第4期。

[12]刘畅、袁易卿、孙中伟、何雪松,2020,《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设计、实施与样本描述》,《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13]陆健、齐晔、郭施宏、张勇杰,2019,《组织学习、知识生产与政策倡导——对环保组织行为演变的跨案例研究》,《中国非营利评论》第2期。

[14]陶传进,2012,《水环境保护中的 NGO——理论与案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5]王名、蔡志鸿,2019,《以“能力专属性”论政社合作——以两岸防艾社会组织为例》,《中国非营利评论》第1期。

[16]王诗宗、宋程成,2013,《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17]王思斌,2011,《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18]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19]肖小霞、张兴杰,2012,《社工机构的生成路径与运作困境分析》,《江海学刊》第5期。

[20]杨佳譞、孙涛,2019,《回应性倡导:政策倡导中社会组织有效行动的解释框架——基于 T 市与 S 市的双案例研究》,《公共行政评论》第2期。

[21]叶士华、何雪松,2021,《理事会能够提升社会组织绩效?——基于全国 691 家社会服务类组织的实证研究》,《公共行政评论》第1期。

[22]张紧跟、庄文嘉,2008,《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 NGO 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第2期。

[23]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2009,《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第4期。

[24]赵挺、袁君翱,2022,《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国外文献的述评与启示》,《中国非营利评论》第1期。

[25]郑广怀、向羽,2016,《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及启示》,《社会工作》第5期。

[26]Almog-Bar, M. & Schmid, H. 2014. "Advocacy Activities of Nonprofit 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s: A Critical Review."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3(1).

[27]Amy, J. H. & Thomas, D. 2003.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tegrating Agenc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8(3).

[28]Andrews, K. T. & Edwards, B. 2004. "Advocacy Organizations in the U.S. Political Proces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29]Berry, J. M. & Arons, D. F. 2003. *A Voice for Nonprofit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30]Bloodgood, E. & Tremblay-Boire, J. 2017. "Does Government Funding Depoliticiz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xamining Evidence from Europe."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

[31]Brown, W. A. 2007. "Board Development Practices and Competent Board Members: Implications for Performance."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17(3).

[32]Chavesc, M., Stephens, L. & Galaskiewicz, J. 2004. "Does Government Funding Suppress Nonprofits' Political Activ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2).

[33]Dalton, R. J., Recchia, S. & Rohrschneider, B. 2003.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the Modes of Political A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7).

[34]Evans, P. 1995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5]Gaudreau, M. & Cao, H. 2015.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Adaptive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NGO Networks in Nanj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24(4).

[36]Guo, C. & Saxton, G. D. 2010. "Voice-In, Voice-Out: Constituent Participation and Nonprofit Advocacy." *Nonprofit Policy Forum* 1(1).

[37]Guo, S. 2023. "Policy Advocacy of Nongovernmental Or-

ganizations in China: A Quasi-Replication of Zhan and Tang (2013, 2016)." *Public Administration* 101(2).

[38]Heurlin, C. 2010."Governing Civil Society: The Political Logic of NGO-State Relations under Dictatorship."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1(2).

[39]Ho, P. & Edmonds, R. L. 2008.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40]Howell, J. 2015."Shall We Dance? Welfarist Incorpo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Labour NGO Rel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23.

[41]Hudson, A. 2002."Advocacy by UK-based Development NGO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1(3).

[42]Kelleher, C. A. & Yackee, S. W. 2009."A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Contracting: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State Agency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9(3).

[43]Kim, S. E. & Kim, Y. H. 2015."Measuring the Growth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5(2).

[44]Leroux, K. & Goerdel, H. T. 2009."Political Advocacy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 Strategic Management Explanation." *Public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Review* 32(4).

[45]Li, H., Lo, C. W. H. & Tang, S. Y. 2017."Nonprofit Policy Advocacy under Authoritarian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7(1).

[46]Lin, T. 2007."Environmental NGOs and the Anti-Dam Movements in China: A Social Move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sues and Studies* 43(4).

[47]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7."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6).

[48]Mosley, J. E. 2011."Institutionalization, Privatization,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y: What Tactical Choices Reveal about the Policy Advocacy of Human Service Nonprofit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0(3).

[49]Mosley, J. E. 2012."Keeping the Lights On: How Government Funding Concerns Drive the Advocacy Agendas of Nonprofit Homeless Service Provider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2(4).

[50]Moulton, S. & Eckerd, A. 2011."Preserving the Publicness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Resources, Roles, and Public Value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1(4).

[51]Ni, N. & Zhan, X. 2017."Embedded Government Control and Nonprofit Revenue Growt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7 (5).

[52]Oberschall, A. 1993. *Social Movements: Ideologies, Inter-*

ests, and Identities. NJ: Transaction.

[53]Onyx, J., Dalton, B., Melville, R., Casey, J. & Banks, R. 2008."Implications of Government Funding of Advocacy for Third-Sector Independence and Exploration of Alternative Advocacy Funding Models."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3(4).

[54]Pfeffer, J. & Salancik, G. R. 2003.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5]Reid, E. J. 1999."Nonprofit Advoc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 B. Elizabeth & C. E. Steuerle(eds.), *Nonprofits and 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56]Rothman, J. & Mizrahi, T. 2014."Balancing Micro and Macro Practice: A Challenge for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59(1).

[57]Saich, T. 2000."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61.

[58]Schlnzman, K. L. & Tierney, J. T. 1986.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59]Slyke, D. M. V. 2007."Agents or Stewards: Using Theory to Understand the Government-Non-profit Social Service Contracting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7(2).

[60]Spires, A. J. 2011."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1).

[61]Stroup, S. S. & Murdie, A. 2012."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NGO Advocacy."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7(4).

[62]Teets, J. C. 2018."The Power of Policy Network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hang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China." *Governance* 31(1).

[63]Vidovich, L. & Currie, J. 2012."Governance Networks: 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s of Corporate and Nonprofit Boards."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22(4).

[64]Wang, M. & Liu, Q. 2009."Analyzing China's NGO Development System." *The China Nonprofit Review* 1(1).

[65]Yang, G. 2005."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81.

[66]Zhan, X. & Tang, S. Y. 2013."Political Opportunities, Resources Constraints and Policy's Advocacy of Environmental NGOs in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91(2).

[67]———. 2016."Understan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Government Ties for Nonprofit Operations and Func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6(4).

[68]Zhang, C. 2017."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The Emerging Disability Movement and Advocacy in China." *Disability & Society* 32(7).